

N 本期聚焦

推进“双创”需澄清几个误解

陈 宪

有人认为，经济下行时，政府就会鼓励人们创业，尤其是大学生创业，以缓解就业压力。这种说法实际上是将“双创”视为权宜之策。我们知道，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过快下滑，采取了一系列刺激政策。但是，由于外部需求冲击比预想更严重，加之内部结构性矛盾的演变，2014年至2015年，我们相继提出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新判断和新举措，“双创”是其中的一个具体途径。我们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实现中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双创”绝非权宜之策，而是转型大计。

当“双创”在全社会得到宣传和推进之时，又有人认为它是搞群众运动，意即“双创”过热了。我们可以将这种说法看作善意的提醒。但创业创新的本质是试错，而且通常是成功率很低的试错。在这个前提下，只有两个办法可以增加成功率：一是更多的人投身创业创新，在成功率为一定时，就会有更多的成功者；二是通过改善和优化创业创新生态系统来提高成功率。当然，就像股民经常听到的那句话——“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创业创新也是一个高风险活动，在作出这一选择前，需对主客观条件予以全面分析和评估。

观察和研究均表明，人群中风险偏好高、组织能力强、性格特质适合创业创新的人，本就是一个小众人群，且相对稳定。所以，对于创业创新的成功来说，生态是一个相对更加重要的问题。当我向李克强总理汇报深圳的创业创新生态时，他问道：你们是否有这方面进行比较的材料？可见，他是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的。事实上，在这次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多次提到“为创业创新者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在他看来，实施鼓励创业

创新的政策取向，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关于“双创”，人们常常讨论的还有一个效率问题。有观点认为，大众创业的效率太低了。这里的效率低和上面说的成功率低是一个相近的问题。不过，效率低有一个比较的问题。在全面过剩的条件下创新创业，创业者试错是和需求试错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对”的人要用“对”的事来证明自己，才有人愿意投资。人和事都为“对”的事，当然是小概率事件。这个试错过程会烧掉很多投资，产生大量沉没成本，但舍此就没有办法发现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乃至新兴产业。所以，如果说这样的创业创新效率低，那也是不得已的。人们现在在讨论，大数据技术能否助推精准找到需求？现有情形表明，大数据在找到并对接现实需求方面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在转化潜在需求方面尚显得力不从心。所以说，创业者和企业家的试错是无法替代的。

将“双创”仅仅与初始创业联系在一起，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错误认识。其实，在生动的“双创”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样化的创业，除了初始创业，还有大量的平台创业，即内部创业。早在2000年8月，华为公司就出台内部创业的管理规定，公司先后有多名中高层管理干部内部创业，组建了多家新公司。华为手机就是华为内部创业的成果。李克强总理日前视察的航天科工集团“航天云”创业平台，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平台创业比较成功的还有海尔集团，该公司的新业务基本都是通过平台创业拓展的。类似的做法，在国际上也很有流行。

这种新模式使央企和中小微企业不再是简单的上下游配套关系，而可以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服务、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事实上，在此次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对于目前出现的大中小企业



激 活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融通发展的趋势也给予了关注，并提出“政府的管理模式相应都要随之转变”。平台创业有公司的支撑，有相对完善的生态系统，有望提高成功率；融合创业是一种再创业，有比较确定的业务项目，也将促进成功率的提升。

把推动“双创”等同于鼓励大学生创业，是另一种常见的认识误区。有人认为，大学生创业没有第一笔投入，通常会问父母要。由于试错为“对”是小概率事件，所以这笔钱大多无法收回。这种行为无疑是对中等收入家庭的“洗劫”。这个看法显然有失偏颇，但也给出了提醒。我们要让有意创业的大学生明白，创业需要资金，但它不来自父母。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家长，养老的钱是不能给子女创业的，血本无归是大概率事件。

坦率地讲，大学生缺乏人生历练和资源积累，的确是最适合创业的人群。数据显示，成功创业的人群大多在30岁至40岁。现阶段，中国还没有真正培

养综合型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创业创新生态也不尽完善，故大学生还不可能是创业创新的主力军。这也提出了一个新的努力方向，即在大学培育学生的创业创新精神和技能，是完全必要且必须加强的。就此而言，当创业创新主体从“外生移民”转向“内生人才”时，建设类似美国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这样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营造多层次、开放的创业创新生态圈，应当成为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深入探讨的课题。

总而言之，“双创”是重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重大战略，是培育经济中长期增长动力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源头活水。在经济新常态的引领下，“双创”是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生动实践的，正在引导中国经济不断跨越、不断奋进。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

N 有此一说

当代青年婚恋模式出现新趋势

李春玲

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急剧的社会变迁，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社会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态度与观念也随之改变。这导致代际现象日益突出。以“80后”和“90后”为代表的青年群体成为社会新事物和新潮流的代言人，也自然成为社会学家观察社会变迁和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重要研究对象。

近10年来的青年研究反映出当代中国青年的两个主要社会性特征：突出的代际差异和较强的阶层分化。一方面，大量研究显现出青年一代与中年、老年群体代际间的明显差异。事实上，即便在青年群体当中，“80后”与“90后”也有差异，甚至“80后”内部也有“85前”和“85后”的差异。另一方面，青年群体本身的社会分化较突出。青年农民工和大学生及大学毕业生是青年群体中两个最大的子群体，其教育经历、就业及生活状况和未来发展机遇大为不同。“80后”是打上代际与阶层双重烙印的一代，代际共性未能打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模式，跨越层的代际文化无法突破社会生活领域中的阶层分割。

城乡不平等和家庭背景的阶层差异影响了青年一代的受教育机会，教育分层现象十分突出。教育的分化最终导致青年人的就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竞争中，学历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是决定个人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然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却使来自农村家庭和弱势群体的孩子在教育机会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强化了阶层地位再生产。大量有关青年职业和社会流动的实证研究证明，社会经济地位的再生产导致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分化。

近20年来，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并深入到青年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得互联网对青年的影响成为青年研究的又一新重点。当代青年被称为“互联网的一代”，他们是网络参与最活跃的人群，青年研究学者从多方面研究了网络社会的兴起对青年的生活、观念、行为和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些研究指出，互联网上形成了青年的网络社区，这些虚拟社区具有媒体化、娱乐化和社交化的功能，其特征主要表现为成员的年轻化、文化的多元化和功能的实用化。青年通过网络社区的互动交流情感和思想，形成独特的文化。

另一些研究注意到，网络时代的青年认同出现了困境：青年的虚拟认同与现实认同之间存在张力；青年的社会认同存在不确定性；青年的社会认同面临的阻力增大；青年的社会认同面临场域的转换。也有研究发现，互联网已全面渗透到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网络消费、网络交往、网络休闲娱乐、网络政治参与成为青年生活方式的新时尚和新主流。新型的生活方式给青年带来全新的生活体验，同时也对青年社会化产生了极大影响。互联网的出现及迅猛发展、社会信息获取和处理手段的变革使青年社会化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

社会经济急速变迁导致的代际之间的观念与行为差异在婚恋方面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也成为青年研究的热点问题，尤其是一些新的婚恋现象，更是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一些学者注意到，“父母逼婚”和“剩女现象”导致了青年人的“婚恋焦虑”。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婚姻焦虑”，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代际之间关于婚姻问题的一种冲突。

许多研究都发现，当代青年人的婚恋模式出现了与传统观念不同的新趋势。基于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夫妇婚龄差模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的“男大女小”的婚配模式有所改变，“男大女小”的婚配明显减少；而“女大男小”的婚姻明显增多，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和婚姻观念的转变等因素有关。青年人“闪婚、闪离”现象增多，“试婚”成为单身青年追求理想婚姻的一股“潜流”。经济条件在青年择偶因素中的重要性上升，财产公证成为青年防范婚恋风险的无奈选择。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N 学有所思

当前科技创新和竞争出现新特征

刘燕华 王文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以工业4.0新硬件为标志的颠覆式创新时代已经打破了传统的理念和格局，对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治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目前，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已经渗透到了许多领域，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蒸汽机的发明推进了机械化，电的发明推动了电气化，而这一次科技革命比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影响都要猛烈，它全方位、多领域、广渗透，要重新洗牌是不可避免的。石器时代的结束，并不是因为地球上没有了石头，而是有了新的替代品，新的替代品必然有新的操作和管理规则。技术进步也会挑战社会的治理，也会挑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制度。所以说，新的时代创新与竞争体系将有新的特征。我们大概总结一下有三个基本特征。

■ 竞争方式已经呈现了转型

创新过程中有研发阶段、产业化阶段和市场化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许多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很多的创新活动。因此来说，社会重新组织分工和链接是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创新就要把各种力量连成环，形成良性循环，才能产生上升；只有在上下游互动的情况下，才能真正实现创新的目标。这里我们就要问，我们每个人的创新活动，是采取了合伙人制度吗？因为合伙人制度已经成为创新的主导方式。

创新层面的竞争愈演愈烈。创新应该有5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科技革命，比如从手算到计算

机，从口传到电信；第二个层面是从手工到机械；第三个层面是关键技术，也是核心技术；第四个层面是工艺流程，它为解决生产流程扩大再生产，比如搞物流；第五个层面是发明革命。

在新的竞争中，处于高端的创新活动对低端创新活动将实现优胜劣汰。新兴产业必将淘汰落后的或者是僵尸产业，比如：扩大零售连锁的努力被网购冲得一塌糊涂；感光技术的进步被数码相机冲得微不足道；3G通信的市场网络在4G和5G到来的时候也不得不黯然退出。创新的竞争不是你付出了多少努力，而是你站哪个台阶上，否则就有可能被淘汰。因此，每个创新的人要问一问自己，我的活动是在哪一个台阶上，假如处在低的台阶上，应该要想办法向高的做。

创新要跳出传统，实现思维和观念的创新。比如说马拉车有很多可以研究，但是所有的研究超不过一个局限，车跑不过马跑的速度。我们只有跳出牵引式的思维方式，然后才有新的交通工具，找到内生动力，才有火车。也就是说创新活动必须保持一种心态，就是与众不同，避免同质化，防止跟随，防止恶性竞争。我们必须要有多样化，要从宏观的角度，从各个方面进行包抄。所以扪心自问，我们搞创新活动的人，你有特色吗？你的创新是不可替代的吗？假如这个问题回答不清楚，我们的创新活动往往是低效的。

当前的信息化时代，大概有80%-90%的成功是来自于逆向创新。逆向创新有很多例子，主要指的是利用信息时代，利用井喷式的知识增长，在已有知识基础上进行新的知识加工。它是根据市场需求、通过学科交叉来实现

更高层次的创新。也就是说在新的时代，只有掌握用户才能占领市场，实现创新。要通过量身制作才能获得市场份额，只有通过学科交叉才能够使我们的创新解决实际问题的，既要考虑微观又要考虑宏观，我们既要知道某一个知识，同时也要了解更多的知识。所以在新的时代，创新的竞争不是在某一个领域的高精尖，而是在多个领域的结合上。

■ 创新云服务平台引领竞争

我们现在竞争的已不是某项技术，而是环境。我们都知道“德国工业4.0”，也知道“中国制造2025”，对比一下会发现它们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德国工业4.0”瞄准的是九大产业云平台建设，认为把云平台建设好之后，不管是科学家、企业家，还是社会，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发展，使整个产业或者产业群体实现进步；“中国制造2025”则是瞄准了十个产品，瞄准一部分企业，让它们发展起来。

当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没有进入到4.0时代，我们还在2.5时代，这两个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云服务平台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国际竞争的焦点。我们都知道要想成功必须要有条件，中国有一个比喻，叫做鲤鱼跳龙门。但是如果是水离龙门有十丈高的话，再好的鲤鱼也跳不过。同样，如果我们把“水位”设得高高的，肯定有很多“鲤鱼”进不来，所以竞争重点在于我们有没有创新的服务平台，而且这个平台是在信息化基础上的云平台。

中国科技体制正处于一个深度调整期，创新服务平台将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中国整个体制

改革的好与坏，往往取决于我们的大环境建设。

■ 智力资本将占领价值链的高端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体力和资本的投入来拉动，并成为世界范围的制造业大国，但是中国还没有成为创造型的大国。中国要摆脱处于世界经济价值链低端的困境，必须要把优化资源配置的重点放在打造智力资本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智力劳动是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和较复杂的劳动。也就是说，智力劳动需要较多的时间积累以及教育培训成本，它创造的价值也远远超过社会的平均劳动。智力资本在新时代是一个企业、组织乃至国家最有价值的资产，智力资本是通过过程中的无形资产形成有效的价值增值，这里包括核心技术、人才结构、运行模式与经济融合。

经济发展靠产业，产业发展靠人才，人才的核心就是智力资本的产出。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智力资本的作用，发挥智力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让将才、帅才、领军人物发挥出更大的创造力。我们必须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中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理念，强化智力劳动成果具有交换价值的理念，承认智力劳动成果的付出需要得到合理的回报，从而建立起智力劳动成果价值补偿机制。

（作者分别为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科技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观点集萃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处理好“条”“块”关系

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张学良在《经济日报》刊文指出：在经济新常态下，适应区域发展新形势，制定和实施好区域发展战略，需要重视处理好“条”与“块”的关系。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区域发展重心不断转移调整，已改变了过去传统的“东、中、西部”条状区域发展思路，部分地区或城市群的“块状”区域规划上升为国家

战略。因此，在未来区域发展思路上要进一步处理好“条状”与“块状”关系，加强群带耦合。一方面要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以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另一方面，要促进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成熟城市群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以带串群、以群连带，进一步加强群带耦合。

创新已成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

西南财经大学倪玖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周小娟在《光明日报》刊文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与新一轮科技革命交汇的大背景下，创新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文化产业实现创新发展，必须系统推进文化消费习惯的升级、产业链各环节的完善、各种类型文化企业的发展壮大，形成合理的市场生态。新形势下，还应树立互联网思维，搭建文化项目平台，在文化企业之间以及文化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形成交流、互动和共享机制，在更大范围形成文化产业发展的共生效应和集聚效应。同时，良好的管理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要提升管理效能，就应坚持重心下移、上下贯通，在发展潜力大、集聚程度高的文化产业功能区、文化产业园区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此外，还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既制定实施针对性强的保护办法，又提供知识产权申请、评估、交易等服务，保护和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引”“用”“改”是留住“海归”的三大法宝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研究员、人力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泽在《文汇报》刊文指出：留学人员是宝贵的人才资源，做好留学人员工作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留学和海外人才的重要作用。如何让在海外学成归来的优秀人才发挥重要作用呢？一要关注“引”，以项目为纽带，引进世界一流水平、对国际大都市发展、对全球人才枢纽具

有重大影响、能带来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精英；二要更加重视“用”，充分发挥现有创新基础、资源禀赋和独特发展优势，加快培养一批世界一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构建新一代科技园区，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突出能力业绩、淡化“官本位”色彩的人才管理制度和人才评价制度、服务体系；三要突出抓紧“改”。通过服务“海归”，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和治理模式。